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对国难的关注与宣传

——以《民声周报》为中心的考察

张帆^{1,2}

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2. 郑州轻工业大学 河南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九一八事变次月,左舜生等人在上海创办抗日救亡刊物《民声周报》,该刊认为日本侵华蓄谋已久,此次事变关乎国家存亡,绝非偶然或局部事件。基于此,《民声周报》构建了相互关联、着眼长远的救亡策略:内聚国力,筑牢救亡根基;外抗侵略,武装外交并用;长远复兴,经济、教育自立自强。秉持坚定抗日立场的《民声周报》凭借稳定的出版发行、系统性与前瞻性的主张,兼怀理性与情感的文风,成为当时救亡舆论场域中极具代表性的抗战宣传阵地。《民声周报》不仅展现了知识界对国难的关注与宣传,更凸显出抗战的最终胜利离不开包括知识界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艰辛探索筑牢的根基。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民声周报》;知识界;抗日救亡;宣传

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5.06.00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5)06-0012-10

202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人民 14 年艰苦卓绝抗战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九一八事变次月,左舜生等人在上海创办的《民声周报》,成为较早的知识界抗战宣传阵地。《民声周报》主要撰稿人有左舜生、陈启天、王造时等,设置栏目有“短评”“专文”“这一周的国难”等,1932 年 10 月停刊,共出版 38 期。目前学界对于该刊的研究主要涉及撰稿人的相关情况,如李传利^[1]的《陈启天“新法家”思想源起探析》,李艳红^[2]的《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

政治活动研究》和李献礼^[3]的《中国青年党的抗战建国思想研究》,但鲜有以该刊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鉴于此,本文拟以《民声周报》为考察中心,力图还原知识界以报刊为宣传阵地为抗战建言献策、鼓舞人心的历史场景,彰显国难中知识界不屈之气节和参与国事、为国奉献的抗战精神。

一、《民声周报》对九一八事变的分析与判断

《民声周报》“以言论赞助实际抗日运动”^[4],对九一八事变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日本

收稿日期:2025-06-26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5-ZDJH-126);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教学工程“课程思政与美育专题研究与实践”项目

作者简介:张帆(1987—),男,河南省郑州市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郑州轻工业大学兼职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侵华企图有着比较准确的判断,这构成了该刊救亡主张的认知基础。

首先,《民声周报》认为日本侵华蓄谋已久,九一八事变绝非偶然。该刊敏锐地观察到人口、粮食、资源等问题对日本发展的制约,“日本国土狭小,财源枯竭,人口过多,为谋经济出路起见”^[5],必然会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民声周报》揭露日本为使其民众支持对中国东北的吞并,很早就从教育、宣传等方面入手,如在地图上把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绘成一种颜色;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派出擅长辩论的社员在日本“各主要城市进行游说,以唤起国内舆论”^[6]²⁸,在报刊上鼓吹中国东北富饶,鼓励日本人前往经营。鉴于此,《民声周报》断定九一八事变绝非一些抱侥幸心态之人所谓的意外发生、偶然事件,而“是其六十年来目注心营的侵略政策之大爆发,之总成绩,之孤注一掷”^[7]。其次,《民声周报》认为九一八事变关乎全局。该刊指出,此次事变绝非局部冲突或可轻易化解的“误会”,日本的目标远不止于中国东北,根据田中义一内阁的“大陆政策”,“不仅要独占在华利益,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而且要并吞整个中国,消灭中华民族”^[8]。日本不仅将征服中国东北看作征服中国全境的第一步,更将征服中国视为其称霸世界的基础。因此,此次事件对中国而言,“乃是救亡的问题”^[9],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挑战。

基于上述对危机的认知,这份诞生于国难深重时刻的报刊,以其撰稿人的敏锐观察和坚定态度,发出了知识界救亡图存的先声。以《民声周报》为宣传阵地,左舜生、陈启天、王造时等一批知识分子针对中日两国实力对比与中国国内情况,刊发了百余篇文章,形成一套应对空前国难的救亡主张。

二、《民声周报》的救亡主张

纵览《民声周报》,其救亡主张可以凝练为相互关联、着眼长远的三个层面:其一,消弭内争、鼓舞民气是为了内聚国力,筑牢抗日救亡根基;其二,武装御侮、运用外交是政府主导下外抗侵略的有效办法;其三,经济绝交、教育兴邦,需要全民参与,短期可以打击日本经济,为抗战培养人才,长期则意在振兴生产、新民启智,着眼于长远的国家复兴。

1. 内聚国力,筑牢救亡根基

《民声周报》提出,国之御侮,首在自强,日本对外扩张固然是其长久计划,但中国遭受侵犯的主因“在内而不在外”^[10]。因此,整合内部力量、凝聚民心士气,成为救亡策略的重要一环。

(1) 消弭内争,举国一致

《民声周报》认为,当前最大问题在于无法做到举国一致,军阀以人民牺牲为代价,年年相残,“一盘散沙,真是我们惟妙惟肖的写真”^[11]。中国长期陷入政治人祸,内耗不已,一切建设无从谈起,严重阻碍了国家发展。各派势力养兵虽众,却勇于内争而怯于对外,国内兵祸连年,“除了残杀同胞的用处外,对外人只会不抵抗与镇静”^[12],此为军民不一致、军队不一致。国民党排斥异己,不给民间团体合法发展空间,以致民众意气消沉,“对国家之观念日淡”^[13],很难与当局同舟共济,此为当局与民众不一致。国民党内少数人企图独揽大权,其实力又不能将所有反对派一律打倒,结果派系林立,倾轧不断,此为国民党党内不团结。这些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九一八事变前,有识之士已预感日军的侵略战争就要爆发,应加强东北国防,但当局却“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14],引得外敌乘隙而入。

战事已起,中国必须尽快团结,以举国之力

抵抗日本侵略。《民声周报》分析:“全国上下究竟能否一致对外,其枢纽全在政府。”^[15]《民声周报》提出此时不应讨论推翻国民党当局,而要促使其痛改前非。在民众爱国热潮和国难当头的双重力量推动下,国民党“近年举措的失当,或有改正的可能”^[16]。如何改正?首先,需要国民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预备召集国民大会”^[17],倾听各方声音,与民众保持一致。其次,需要国民党改变打压异己的做派,国民党外的政治团体也应有发展空间,“其他党派必须在法律上有参政的自由和机会”^[18]。最后,需要国民党当局放弃偏见,“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5],给所有爱国之士以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机会,团结全国的力量。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消弭内争,凝聚国力,与侵略者正面相抗。

(2) 鼓舞民气,动员民众

国家能否处危应变,根本在于民众,民众的爱国情感与应变智慧和民间所蕴含的磅礴能量是国家抗击外侮最好的凭借。《民声周报》回顾了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一再堕落,强权压迫往往逆来顺受,虽偶有反抗,但“多是五分钟的热血,有始无终”^[19]的状况。当然,民族精神的堕落、民气的消沉,主要责任不在民众,实则要恨各路军阀权贵对于人民之戕害,对于民气之摧残。连年内战“不知死了我们多少有用的壮丁,不知葬送了我们多少青年有为的学子”^[20],除却活着的少数“安富尊荣”的权贵,广大民众只能在重重压迫下苟延残喘,社会死气沉沉,已把“民族国家的观念抛到九霄云外,向着自私自利的深渊堕落下去”^[21]。国家本应是全国人民所共有的,但国民党“不做团结国民的工夫,而做排除异己与压抑民气的勾当”^[22],民众苟活而已,很难生发出强烈的爱国情感。

《民声周报》痛感于此,连续发文呼吁当局停止迫害爱国运动,保障人民权利,“立刻解放

这四万万个被人看成了奴隶的主人”^[23],给予人民参与国事的空间,使人民的力量能够最大程度表现出来。中央大学师生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十天发动示威请愿并发布告全国书有云:“国难时期,全民救国,任何人应有救国权,自政府取缔民众运动以来,民气消沉极矣。”^[24]《民声周报》予以转载,一同呼吁政府要与民众开诚布公,处危应变“惟一要诀,在鼓舞民气,不在摧残民气;在服从民意,不在逆抗民意”^[25],唯有如此,民众才能够不受压制地参与国事、贡献力量,才会深切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救国是自己的责任,进而激发情感共赴国难。

2. 外抗侵略,武装外交并用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枪口,《民声周报》始终主战,提倡在不盲目寄希望于外力调停的前提下运用外交手段,反对妥协退让,力主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

(1) 反对妥协,武装御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方全未抵抗”^[26]。南京政府对外希望国际联盟发挥作用,对内要求国民刻意忍耐,表示“深信日本终能尊重世界公意,依照国联决议于十一月十六日前将军队完全撤退”^[6]^[426]。中国共产党则在 1931 年 9 月 20 日的宣言中呼吁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27]。与中国共产党对日态度相仿,《民声周报》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与“和平解决”做法,“政府既以无抵抗主义误之于前,如果再与日本直接交涉,和平解决便不免近于甘心卖国”^[28],亦认为应对此次事变,需“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5]。对于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实力不能和日本相比,因而反对民间抗日,并鼓吹“我国国民当此时机,务须共助政府,镇静应付”^[29],期待列强调停等论调,《民声周报》予以尖锐批评,认为在国难当头之

时持类似论调者均属“待亡主义”^[30],看似理性中道,实则怯懦误国。

《民声周报》没有回避中日双方军事力量悬殊这一事实,亦清楚指出,开战后短期战局可能会对中方不利,但这不是怯于抵抗的理由。况且战端一开,除了军事,国际形势、两国国情等都可能影响战争胜负,军事实力偏弱的国家,并不是不能与强敌作战。其一,中国既然呼吁国际干预,希望外国援助,就得真刀真枪地抵抗,让国际上看到中国人不愿做亡国奴。“假如自己不起来作最后之挣扎……试问怎能引起世人的同情呢?”^[31]其二,因为日本自身的利害关系,其与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是无法共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目前国际形势观之,终不能幸免”^[25],即便中国忍辱退让,侥幸避战一时,将来仍会面对战争。其三,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日本很难快速征服中国,战事势必持久。被占领区民众,可以实行“野战抗日”^[32],破坏日寇控制的铁路、工业等设施,使其无法顺利掠夺资源。其四,对日作战可以化解国内纷争,对日战端一开,或可借此机会将“一切个人的、党派的或地方的军队,统统改造成国家的军队”^[19],消弭内争,抗战建国。其五,即便中国不幸战败,依然比毫无抵抗做顺民要光荣得多,宣战与抵抗可以锻造民族的精神,“因为这种反抗的精神,不但可以寒帝国主义者之胆,并且可以激起国民爱国的热诚”^[5],就算不幸亡于一时,却保留了民族自觉的火种,终有复兴的一天。

(2) 运用外交,孤立日本

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外交斡旋的顾维钧曾言,“国联没有可以使用的手段来对日本及其军部施加压力迫使其撤军”^[33],但诉诸国联、运用外交可以引起世界注意和国际舆论,至少可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民声周报》批评了国民党当局似乎一心寄希望于国联、列强调停的做法,但并没有忽视外交的作用,认为外交手段

可以与武装抵抗相辅相成,武装抵抗是外交斡旋的底气,外交斡旋则可以戳破日本对国际社会的欺骗,有助于中国获得国际同情,争取外部力量支援战场。《民声周报》建议,外交人员应赴各重要国家疏通,“以障碍敌人的进行,建树自己的声援”^[34]。以事实为明证,晓以利害,让国际各方知晓日本这一次在中国东北的暴举,不只是对中国一国的侵略,亦是对全世界的威胁。如果对日采取放任与绥靖政策,日本一旦借此机会占据中国东北广阔地域,“若经其十年以内之经营,必可供日本在世界上称第一等强国”^[35],届时日本再发动战争,对全世界的危害更深。所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只是保家卫国,亦是保卫全人类的和平;各国对华施以援手,不仅是在捍卫公理与正义,也是在维护自身安全。

以国联组织的调查团为例,《民声周报》强调虽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于调查团,但依然要郑重其事,因为日本一定会试图欺骗、误导调查团,如中国不予以反击,调查团很可能作出错误判断。事态发展确如《民声周报》所言,1932年夏,调查团来到东北,日本方面使出了种种卑劣手段,如“极端限制中国人与该团员等单独会见”,预先告知受访人士“应当如何说话”,在受访时随行监视,并找汉奸“向调查团作假民意的报告”^{[6]462-463}。《民声周报》主张为戳破日方伪饰,使真相大白,中国的陪同人员应该熟悉外文,预备反映东北真实情况的外文资料,“作充分的准备以接待调查团”^[36]。进一步,《民声周报》支持外交人员在广阔的国际外交平台上展示中国抵抗的决心,宣传中华民族自卫的崇高,“运用外交手腕以孤日寇的声势”^[34],争取援助,引发国际干涉,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3. 长远复兴,经济、教育自立自强

在军事和外交之外,《民声周报》还探讨了两个关键领域——经济与教育。该刊视对日经

济绝交为全民皆可参与的有效抗敌措施,教育则可使民众培育爱国情怀,为抗战输送人才。经济、教育自立自强,会为国家建设、国力提升提供持续动力,不仅有益于当时救亡,更有助于国家长远复兴。

(1) 经济绝交,提倡国货

《民声周报》分析说日本国内市场有限,资源不足,依赖中国供给原料,向中国销售工业制成品,“对我国之贸易额总是出超的趋势”^[37],因此,日本国内经济景气与否与中日两国的经济往来情况息息相关。中国虽从日本进口商品,但其中一部分为奢侈品,一部分为并非不可替代的工业制品。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总体来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低,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高。在是否武装抗日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经济上的抵抗却是比较好实行的,不必等政府下令、协调,民间立刻就可以自发进行。如果中国不向日本提供原料,国民团结起来排斥日货,便是在经济层面很好的一击,日本的制品失去中国广阔市场,又缺乏原料供应,“内部必立即呈现经济大恐慌”^[38]。中国还可以进一步实施更为彻底的经济绝交,“不以人力卖给它”^[34],如不在日本工厂做工,不在日本银行存钱,中国人的工厂、学校亦不雇佣日本人。各种经济绝交手段综合使用,当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有效抵抗。

《民声周报》回顾此前历次抵制外货运动,结果以失败居多,表层原因在于无法持久,深层原因在于国货不强,“外货以喧宾夺主,充斥民间”^[39]。对于无法持久这一表层原因,《民声周报》建议青年学生可以结合成为民间抗日团体,“不用日货,应该规定为这种团体的必守的规约之一”^[40],大家互相提醒,共同遵守,在民间宣传排斥日货、提倡国货思想,让更多民众受到感染,并乘此时机促成越来越多的民众养成优先使用国货之习惯。对于深层原因,《民声

周报》鉴于以往民间抵制日货,由于缺乏国货支撑,往往只能用其他外货代替的情况,一方面提醒读者排斥日货并不是提倡购买他种洋货,呼吁读者在国货尚未完备的领域践行节制消费的原则,力求生活俭朴;另一方面,“在增加与改良新式货品的生产方面,我们要特别努力”^[39],政府应帮助工商界积极增加生产,发展国货。只要按此方针坚持下去,国家就一定可以达到逐步充实经济实力的目的。

(2) 新民启智,教育兴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多地爆发了为促进政府抗日而举行的青年学子请愿活动。《民声周报》对此表达了支持,同时冷静指出,请愿仅仅是表示决心的方法之一,为长远计,青年学子应回到课堂,努力学习。国难当头之时,上课并不是要放弃抗日,而是要把教育与抗日救亡紧密联系起来,与救国工作相一致。该刊对学校教育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其一,将军事教育设定为中等以上学校的必修课程,让学子们“锻炼出杀贼的好身手”^[41];其二,大学应该加授对日研究的课程,并在各种原有课程中加入救国内容,例如在法律课程中加入国际联盟章约等内容,在中外地理课程中“把东北四省和日本的地理,研究一个明白”^[42];其三,各图书馆应多准备研究对日问题的图书,使国人特别是青年有机会真正明了日本的情形及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多一个明了日本情形的人,我们可以扩大一分抗日的宣传,可以提高一分抗日的热度”^[40];其四,政府应该有教育强军的长期规划,如在高等院校设置相关专业,“并多派留学生往外国学机械以便能自造军用品,不需求于人”^[43]。

《民声周报》亦关注国民教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些民众反应不算强烈,不了解国难。该刊分析,原因一方面源于主政当局的集权和压迫,另一方面则与“自私自利主义特别

发达”^[44]相关,很多民众似乎只要战火没烧到自家门口,就浑浑噩噩、与己无关。《民声周报》认为唤醒民众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推动民众教育。仅在军事这一个层面,就足以看出教育的好处,军人来自民众,有知识的民众多了,有知识的军人也会增加。武器和通信设备的运用、地图绘制、后勤保障、卫生医疗等都需要学识,如果中国军人都接受了教育,军队战力便能得到提升。该刊呼吁,政府应该着力普及教育,使更多国民识字,并接受包括常识和军事在内的国民教育。此外,学者、教职员、青年学生等知识阶层则应肩负起启蒙、唤醒民众的责任,如义务从事教学,或“深入到社会核心,如乡村,如工厂,如街市,如茶馆酒肆”^[34],通过口头和文字,将一般知识与国难事实深入浅出地讲给民众,感化和引导民众。中央与地方呼应,政府与社会力量联合,将知识传播到民间,培养国民自卫的、合作的与舍私顾公的道德,增强国民同仇敌忾的心理,创造国民进取的与适时应变的新文化,以教育改造国民,“我们的教育不是教这四万万自私的个人享蠢人多福,而是教育能争生存求发展而造成现代国家的国民”^[45],从而创造出一个强盛的国家。

三、知识界救亡宣传场域中《民声周报》的特点和价值

九一八事变后,救亡图存的声浪高涨,老牌报刊持续关注国难,新生抗日救亡刊物更如雨后春笋,将同时诞生的《民声周报》置于救亡宣传场域中加以审视,可以更清晰地凸显其特点和价值。

1. 报刊宣传:知识界参与救亡的重要方式

九一八事变后的知识界对国难的关注与宣传,展现出一些共性特征,融入了“共赴国难”的历史场景。比如,以个人、联名或群体名义发表通电、公开演讲;再比如,一些知识分子开始

联合起来,创建了“抗日救国会”“新中国建设学会”等团体,进行有组织的救亡活动。而其中非常显著的,就是知识界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和优势,以报刊作为宣传阵地,动员民众、影响政府。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的言论场域,救亡图存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但不同言论立场的立场并不一致,侧重点也不相同,各种意见、主张与推断层出不穷。蒋廷黻回忆,“《独立评论》同寅中没有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的”^[46]。以胡愈之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学人则是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中主战论的主要代表”^[47],《大公报》与《申报》“前者不顾销路可能下滑的后果而力主和平,后者则不忌触犯政府当局遭到封杀的风险而强烈抨击不抵抗政策”^[48]。除全局性考量的报刊外,还有诸如提倡艺术抗战的《影戏生活》,刊载大量抗日救亡文学作品的《国际协报》副刊,致力于民族复兴话语建构的《复兴月刊》,以照片为主的《黑龙江战事画刊》……以及各种基于区域、行业、学校的救亡刊物。不同立场、主张的知识界刊物共同构成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救亡图存基本共识之上的多元舆论格局。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出印刷品联结起了人们,“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49]。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形成时期,传媒是极为重要的社会变革助推器,办报、著文也就成了知识界参与国事、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他们利用报刊传播信息,开启民智,功不可没。能够读书识字的人,通过阅读知晓天下大事,再将内容转述给他人,报刊恰似一枚投入水面的石头,荡起的波纹由近及远,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信息传播。获得信息的人多了,受到教育和感染的人多了,能够讨论、乐于议论国事的人也就多了。民众对国家的关心逐步增强,也就更加愿意参与国事,报刊的宣传与民间呼声相辅相成促成舆论,沛然莫之能御。

2.《民声周报》:国难中颇具代表性的宣传阵地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舆论救亡大潮中,《民声周报》能够形成一股重要的舆论力量,源于其做到了以下三个方面。

(1) 相对稳定的发行使刊物保持连续影响力

《民声周报》是九一八事变后由几位知识分子临时创办的刊物,其影响力虽远不及《申报》《良友》等大型商业报刊,但在同期诞生的救亡刊物中,其出版时长与期数均位居前列。丁守和等主编的《抗战时期期刊介绍》一书详细罗列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各种刊物基本信息,统计数据显示,1931年9月、10月诞生的101种政论性、抗日宣传刊物平均存续时间为3—6个月,约60%的期刊出版少于5期,不少“特刊”“专刊”只发行了1—2期,且超半数期刊主办方为学生组织或学校团体。在101种刊物中,《民声周报》存续了13个月,排在第8位,共出版38期,排位第5位^[50]。由此可见,即便是因外部压力,最终被迫停刊,《民声周报》依然算是当时发行比较稳定的救亡期刊,这多少得益于左舜生等人丰富的办刊经验、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其所秉持的持之以恒的毅力。这种稳定性奠定了刊物的影响力根基,使其得以在较长时期内,汇聚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以此为阵地,持续而系统地发表救国主张,开展救亡宣传。再者,当时的大部分临时性刊物,发行区域较窄,甚至有些还是未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相比之下,《民声周报》读者区域已算广阔,销路“以江苏为最多,南京城内也有好几百份”^[51],从政府相关查禁令看,《民声周报》至少还曾出现在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广西等地。

(2) 救亡主张具有系统性与前瞻性

《民声周报》的主要撰稿人群体比较固定,

他们不但怀有一腔爱国热血,且多为常年关心国事、有一定政见、有一定社会经历和声望的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人士。在左舜生的主持下,《民声周报》共刊发的百余篇文章侧重于消弭内争、鼓舞民气、武装御侮、外交运用、经济绝交、新民启智等主张,覆盖了应对国难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等关键层面,构成了一套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救亡体系,在当时知识界的抗日救亡论述中堪称典范,体现了知识界为中华民族寻求救亡图存与长远复兴之系统方案的不懈努力。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民声周报》主张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其一,中日之间必有全面战争且战事势必持久,敌后需进行“野战抗日”^[32];其二,抗战需要国民党,所以对于国民党政府批评、督促但不谋求推翻,在政府框架内“设立国防委员会”^[52]统筹总动员。从后续的发展态势看,《民声周报》这两点判断与事实比较吻合。这些判断,在事变发生仅月余、国内尚弥漫着“交涉解决”“依赖国联”的氛围中提出,不仅需要胆识,更显示出《民声周报》对中日关系的理性分析和对国际局势的洞察力,非同期不少仅停留于悲愤呼吁、纸上谈兵的言论可比。

(3) 文章情理兼具,呼应民气

《民声周报》的文章悲愤激昂与冷静剖析交织,以强烈的情感影响读者,以事实陈述和理性分析说服读者。创刊号疾呼“我们发行这个周刊的动机,是激于爱国的天良,是不忍坐视国家的沦亡,是在这个国事危急的时会,要起来担负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与全体国民,共赴国难”^[53],奠定了其悲情与担当的基调。《民声周报》在批判妥协论调时,直斥其为“掩饰他们自己丑态的帷幕”^[54];在呼吁抵抗时,充满血性与决绝:“以我中华民族自身的碧血,洒向我们的敌人,保我光荣的国土!以我中华民族自身的铁力,誓死作抗日运动,救我东北的同胞!”^[43]这些

情感充沛、立场坚定、富有战斗性的语言,极易在国难深重的时刻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和行动意愿。难能可贵的是,《民声周报》的撰稿人还切实参与了一些抗战救亡行动,淞沪抗战时,周天冲“和几位朋友去慰问战地灾民”^[55],常乃德在北平中央公园公开演讲^[32],姜蕴刚在北平贝满女子中学演讲^[56],宣传抗日救亡。这些活动扎根现实、深入民众,既为撰稿人激发了思考,也使其文章言之有物,免于空谈。读者在阅读、讨论这些情理兼具的文章的过程中,很自然地激发出不分南北、家国一体的情怀,进而主动参与救亡运动。如果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相同或辐辏于同一目标,而且又得到种种鼓舞,就会凝聚成巨大的动力^[57]。

四、结语

《民声周报》因与当局相左的主张和对当局的批评,被指为“诋毁党国领袖,淆乱人民听闻”^[58]而遭受打压,由公开发行到秘密邮寄,直至被迫停办,只维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民声周报》的多数建议虽在当时并未直接被当局采纳,但其中蕴含的真知灼见,如动员民众、野战抗日等,却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敌后战场存在着某种联系与呼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个庄重的历史节点,回望抗战起点,九一八事变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以笔为刀,宣传抗日救亡,为唤醒民众、保存中华民族不屈抵抗的精神之火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民声周报》对日本侵华的认识及其救亡主张,是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对于国难关注和参与的一个标杆,“与其他各种刊物的言论以及示威请愿、宣言通电等方式汇合而成的民意和輿情”^[59],融入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抗日大潮中,振奋民心,鼓舞士气,为处于紧急关头的中国凝聚了全民族抗战的精神资源和救亡

图存的条件。这提醒我们,抗战的最终胜利,离不开包括知识界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艰辛探索所筑牢的根基,知识界对国难的关注与宣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自有其可贵的时代价值与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 [1] 李传利. 陈启天“新法家”思想源起探析[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7(4): 126-130.
- [2] 李艳红. 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8.
- [3] 李献礼. 中国青年党的抗战建国思想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7.
- [4] 本刊特别启事[J]. 民声周报, 1932(19): 1.
- [5] 王造时. 我们如何反抗日本[J]. 民声周报, 1931(1): 3-5.
- [6] 中央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九一八事变[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7] 刘天予. 请顾维钧小心点[J]. 民声周报, 1931(12): 4-5.
- [8] 张宪文, 庞绍堂, 等.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卷):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1931年9月—1937年6月)[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 1.
- [9] 张公表. 如何救亡[J]. 民声周报, 1932(16): 6-7.
- [10] 舜生. 问题在内而不在外[J]. 民声周报, 1932(15): 1-2.
- [11] 刘天予. 全国同胞应怎样抵抗残暴的日本[J]. 民声周报, 1931(1): 5-6.
- [12] 胡哲敷. 内战与外战[J]. 民声周报, 1932(16): 3-4.
- [13] 诸青来. 真正举国一致[J]. 民声周报, 1931(1): 3.
- [14]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亲历记[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 2015: 21.
- [15] 陈启天. 对外与对内[J]. 民声周报, 1931(13): 2-3.
- [16] 左舜生. 且看今后的国民党[J]. 民声周报, 1931(4): 2-4.
- [17] 王造时. 对国民党统一会议的要求[J]. 民声周报, 1931(4): 4-5.
- [18] 陈启天. 怎样才能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J]. 民声周报, 1931(4): 1-2.
- [19] 陈启天. 我们主张对日作战的理由[J]. 民声周报, 1931(2): 3-5.
- [20] 舜生. 忍痛含泪祝国庆[J]. 民声周报, 1931(2): 1.
- [21] 唐剑平. 御侮与自反[J]. 民声周报, 1931(13): 10-11.
- [22] 刘天予. 团结同志与团结国民[J]. 民声周报, 1931(3): 2-3.
- [23] 刘仲平. 提高民权的具体办法[J]. 民声周报, 1931(4): 5.
- [24] 中央大学为“九二八”运动告全国书[J]. 民声周报, 1931(2): 10.
- [25] 刘天予. 什么是目前所需要的救国政府? [J]. 民声周报, 1931(4): 6-8.
- [2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 九一八后对日外交之经过[M]//杨奎松. 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 “九一八”之二十.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210.
- [27]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八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48.
- [28] 启天. 日本吞并东北的伎俩[J]. 民声周报, 1931(1): 2.
- [29] 社评: 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N]. 大公报(天津), 1931-09-20(03).
- [30] 余家菊. 打倒待亡主义[J]. 民声周报, 1931(13): 8-10.
- [31] 袁浩风. 满洲问题与非战条约[J]. 民声周报, 1931(1): 8-9.
- [32] 常乃德. 野战抗日: 在北平中央公园公开讲演[J]. 民声周报, 1931(4): 10-12.
- [33] 顾维钧. 顾维钧回忆录: 第一分册[M].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18.
- [34] 刘天予. 一个救亡御侮的方案: 中[J]. 民声周报, 1931(9): 3-7.
- [35] 震冰. 东北四省从此完了[J]. 民声周报, 1931(2): 1-2.
- [36] 袁青华. 我们怎样应付国际调查团[J]. 民声周报, 1931(13): 4-5.
- [37] 杨伟. 论经济绝交足制日本之死命: 一[J]. 民声周报, 1931(10): 11-14.
- [38] 陈启天. 我们主张对日作战的理由: 续前期[J]. 民声周报, 1931(3): 3-4.
- [39] 张恪惟. 抵抗日货的经济意义[J]. 民声周报, 1931(11): 11-12.
- [40] 左舜生. 继续上课以后的工作[J]. 民声周报, 1931(2): 2.
- [41] 刘天予. 评风起云涌的请愿潮[J]. 民声周报, 1931(12): 5-6.
- [42] 王恩懋. 国难中大学教育应有两大改造[J]. 民声周报, 1931(9): 8-10.
- [43] 施莉侠. 非战公约与民族自决[J]. 民声周报, 1932(14): 6-9.
- [44] 陈启天. 为国难告国民[J]. 民声周报, 1931(10): 6-8.
- [45] 谢承平. 对日作战就是救国教育: 上[J]. 民声周报, 1932(14): 9-10.
- [46] 蒋廷黻. 蒋廷黻回忆录[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7: 157.
- [47] 喻春梅, 郑大华. “九一八”后知识界对“战”与“和”的不同抉择: 以《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学人为中心的考察[J]. 史学月刊, 2013(1): 71-79.
- [48] 张玮, 范瑞.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与

- 《申报》关于中日和战问题之讨论[J]. 历史档案,2007(1): 108-114.
- [49]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叻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3.
- [50] 丁守和,马勇,左玉河,等. 抗战时期期刊介绍[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1-753.
- [51] 阿斗. 南京政府对于本报的查禁[J]. 民声周报,1932(23):4.
- [52] 韩续初. 中国国家总动员的我见[J]. 民声周报,1932(15):5-8.
- [53] 本刊同人. 我们的主张[J]. 民声周报,1931(1):1-2.
- [54] 天予. 呜呼,所谓“无济于事”的高调![J]. 民声周报,1931(3):1.
- [55] 周天冲. 前方的灾民与后方的灾民[J]. 民声周报,1932(20):5-6.
- [56] 姜蕴刚. “最后一课”:在北平贝满女子中学讲演[J]. 民声周报,1932(19):11-12.
- [57] 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望[M]. 北京:中华书局,2016:70.
- [58] 江西省政府训令:民字第一五八六号 令各厅处局会所:查禁民声周报等反动宣传品[N]. 江西省政府公报,1932-04-20(55).
- [59] 左双文. 民众、公众舆论与国民政府外交研究:1927—1949[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54.

[责任编辑:刘凤霞]



引用格式:张帆.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对国难的关注与宣传:以《民声周报》为中心的考察[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6):12-21.

本刊数字网络传播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维普网等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其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